

城市商业银行异地设立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

何欢浪 章 韬 吴兰兰

摘要：本文利用金融许可证数据，以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和异地设立银行分支机构管制的取消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和微观机制。研究发现：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并未促进企业出口，但异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显著增加了企业出口；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主要增加了国有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概率，而异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缩小了融资所有制差异，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了企业出口；两种类型的城市商业银行间存在资本竞争效应。

关键词：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国有企业；企业出口
[中图分类号] F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1) 07-0074-18

引 言

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的增长动力减弱，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保持外贸平稳发展，即要“稳外贸”。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很多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问题，且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还存在融资约束的所有制差异。这一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显然不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不利于更好地“稳外贸”。

和美国、英国等国家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导，银行贷款是企业融资最主要的渠道（蔡卫星，2019）^[1]。为了提高银行的资本配置效率，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以政府为主导的银行结构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放松银行业的进入管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国内市场等，我国开始构建银行业市场化体系，增加银行业的竞争程度（蔡卫星等，2012）^[2]。与国有商业银行不同，城市商业银行的国有份额很低，且股东由地方政府、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城市居民入股资金构

[收稿日期] 2021-02-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贸易与投资双向流动影响中国企业高质量创新的新动能与新机制研究”（20BJL04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贸易自由化促进中国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影响机理及路径研究”（2018BJB015）、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曙光计划”项目“对外经济开放和中国企业创新的数量和质量研究”（18SG51）

[作者信息] 何欢浪：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章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吴兰兰（通讯作者）：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信箱 wll9461@163.com

成。城市商业银行的放松管制也打破了城市原有的国有银行体系。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作为银行业改革的关键一步，我国放松银行业市场的准入条件，鼓励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特别是允许城市商业银行异地设立，是否能够促进我国外贸的平稳发展，起到一定的“稳外贸”作用？

图1为1995年至2016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总数的变化。可以发现，从2006年开始，城市商业银行数量有较大的提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银行业市场管制的放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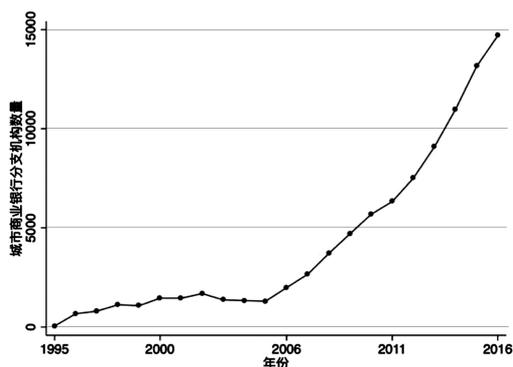


图1 城市商业银行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金融许可证数据。

虽然城市商业银行是在整合原有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设立的，但相比于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给当地的银行业结构带来了更大的冲击（Wang, 2017）^[3]。严格来说，城市信用社属于合作金融组织，而非银行，并且有着严格的存款和借贷限制，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信用社对地方金融业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城市信用社面临着严重的金融问题，但随后组织重建的城市商业银行却很快发展起来，其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在2012年已达到9.24%。

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本文以企业的出口为落脚点，通过研究城市商业银行进入对企业出口的影响，间接考察银行业结构性改革对城市银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全面可信地评估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效果；第二，本文将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分为本地城市商业银行与外地城市商业银行两类，能够更全面、细致地考察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效应以及两者之间的异质性，本文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三，本文发现，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发展对企业出口没有作用，而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能够促进本地企业出口，这意味着，我国政府鼓励中小银行的跨区域发展，而非大银行垄断的改革方向是符合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需要的。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现有关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商业

银行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郭峰和熊瑞祥（2017）^[4]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但是，Wang（2017）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反而对当地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并认为这主要是由企业贿赂地方政府官员从当地城市商业银行获取信贷导致的。由于“晋升锦标赛”，地方政府加强了对地方金融资源的配置（周黎安，2004）^[5]，已有研究也表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绩效更差，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向的影响（Mian，2003^[6]；Beck and Levine，2002^[7]）。第二，关于行业层面的研究，钱先航等（2011）^[8]发现，在晋升压力大的地区，城市商业银行会增加对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的贷款，而这些产业往往是地方经济增长和税收的来源。第三，对于企业层面的研究，蔡宏波等（2020）^[9]指出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导致了地方僵尸企业的形成，但是跨区域兼并重组的城市商业银行则能显著抑制这一效应，且其资金配置效率明显高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

政府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初衷是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缩小企业融资的所有制差异，因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会促进本地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因此，原本未能获得贷款的优质企业也会更容易获得贷款。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放开地方城市商业银行的准入限制，希望发挥商业银行的竞争效应，特别是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因为它们更加接近本地市场，对本地企业有更好的了解，可以起到“近水楼台”的作用，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缩小企业融资的所有制差异。

从政策目标上来看，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发展应当有助于缩小企业融资的所有制差异。但从银行贷款行为的角度，上述判断却可能不成立，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从银行贷款的主观角度来看，银行在做贷款业务时，风险永远是它们所需要考虑的重要指标，国有企业因有国家作为后盾，尽管国企改革已经开始并不断推进，但国企破产重组仍是少数，因此，国有企业总是更具有优先度的客户。而受限于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原本只有最优质的国有企业能够获得足额需求的贷款，劣质的国有企业只能获得勉强维持的贷款。但随着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资金供给扩大，鉴于国有企业的低风险特征，劣质的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贷款，但优质的国有企业已经获取了足够的贷款，资源不会进一步流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信贷资源的误置水平（何欢浪等，2019）^[10]。

其二，企业融资所有制差异的另一大根源在于本地政府干预。相比于五大银行，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涉。为了保持就业、维持社会稳定等，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财政补贴或干预银行贷款的方式阻止国有企业退出市场。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大多仍是本地政府控股，相比五大银行，它们更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干涉（周黎安，2004；Wang，2017）。同时，潜在的坏账可能会使得它们更难从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中脱身。蔡宏波等（2020）指出，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导致很多僵尸企业最终取得了银行贷款，阻碍了其他优质企业的发展。综上所述，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可能依然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歧视”，而更愿意扶持当地的国有企业，甚至是更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即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可能并不能起到“近水楼台”的作用。

相比于大多数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能够实现跨区域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多是经

营状况好、资产质量优的 (Jayaratne et al., 1998)^[11]。也就是说,平均而言,跨区域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置效率要高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异地设立分支机构限制的取消打破了当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垄断,城市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加剧 (Rice et al., 2010)^[12]。随着城市间设立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壁垒的取消,企业银行贷款不仅可以来源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也可以来源于外地更加优质的城市商业银行。此外,地方政府更难影响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很难将非商业行为贷款转嫁到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因此,对外地城市商业银行来说,贷款给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国有企业是其最优的选择。同时,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带来的竞争效应也会刺激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铁瑛等 (2020)^[13]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通过示范效应有效提升了地方金融效率。为了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本地城市商业银行不仅会将资金贷款给当地的国有企业,也会将其业务扩展到生产率水平更高的企业。因此,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可以更好地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真正改善城市的资本配置效率。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待检验假说:

假说1 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对企业出口有负向效应,但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

已有研究指出,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在资源分配等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 (Poncet et al., 2010^[14]; 蔡宏波等, 2020)。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很难改变当地银行的市场竞争行为,从而导致银行的贷款资源更偏向于国有企业。例如,为了满足财政需求或维持社会稳定,地方政府会通过干预银行的贷款行为来维持部分低效率大型国有企业的运行 (聂辉华等, 2016^[15]; 何欢浪等, 2019),这必然会导致银行贷款效率的降低,无法真正发挥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

Brandt 等 (2013)^[16]指出银行业市场的发展会通过银行间市场或其他的渠道提高地区资本配置的效率。以美国银行业放松管制为自然实验, Bai 等 (2018)^[17]指出,美国银行业放松管制使更多的银行信贷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随着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不同类型银行间的竞争加剧,银行因此更有动力提高其贷款效率,加强对借款者的监管与搜寻。这对于优质企业或高效率的非国有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所有制歧视”对非国有企业带来的融资困难问题 (Firth et al., 2009^[18]; 余子良等, 2016^[19]),提高了地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相比较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 (吴延兵, 2012)^[20],也能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其出口水平。因此,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带来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以有效促进相对依赖外部资金的出口活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待检验假说:

假说2 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主要增加了国有企业获取的银行贷款,而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则提高了企业整体所能获取的银行贷款。

近年来,有些文献开始研究银行业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Zhang 等 (2012)^[21]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取决于执法环境,由于中国的执法力度不够,出于风险考虑,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优先贷款对象还是国有企业,即使城市商业银行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但这些企业并不能真正从城市商

业银行的发展中获益。也就是说，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并不能够真正缓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

随着跨区域设立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壁垒的取消，城市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加剧（Rice et al., 2010）。Leon（2015）^[22]发现在银行竞争程度增加的同时，企业接触银行分支机构的机会更多，获取信贷的成本更低，企业更有可能获得融资。肖晶等（2016）^[23]指出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增加能够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不同，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促使地方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增加，企业因此更有机会从银行获取贷款。根据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第三个待检验假说：

假说3 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并不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能增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机会。

综上，与已有研究金融发展的文献不同，本文着重于分析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效应。借鉴郭峰等（2017）和 Bai 等（2018）的做法，本文以各个城市设立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外地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政策冲击，研究其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异质性。

二、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中国银行业体系

如表1总结，1979年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唯一一家银行，同时承担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角色。直到20世纪80年代，四大专业银行的建立才打破了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农工建四大银行的分工严格，业务也互不干涉。这种完全国有的银行体系直到1987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立才被打破。

表1 中国银行业发展事件

时间	事件
1979年前	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内唯一的银行，银行业市场结构是完全垄断市场
1979—1984年	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专业银行成立，打破了中国人民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但银行业市场结构仍高度垄断
90年代初	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允许外国银行机构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
1987年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等股份制银行陆续成立，打破了完全国有的银行体系
1995年	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以深圳市商业银行为标志，城市商业银行开始试点并蓬勃发展
2006年	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正式结束，2006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正式实行，中国银行业迎来了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新时期
2006年	颁布《城市商业银行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城市商业银行被允许在异地（省内与跨省）设立分支机构
2009年	实施《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城市商业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进一步放松

1995年3月,城市合作银行领导小组部署了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石家庄5个试点城市的城市合作银行,此后又将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国16个试点城市。同年9月,《国务院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颁布,并在3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第一批组建工作^①。1998年《关于城市合作银行变更名称有关问题的通知》,城市合作银行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

1995年,全国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深圳市商业银行成立,此后城市商业银行开始广泛试点并发展。自深圳市商业银行成立以来,全国各城市开始分批设立城市商业银行。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6年报》,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共有134家^②城市商业银行,其银行资产占了全部银行业资产的11.4%。

在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之初,其只被允许在该城市内运营,直到2006年《城市商业银行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的颁布,城市商业银行异地(省内与跨省)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才被取消。2009年,《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的实施使城市商业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城市商业银行在同城设立支行不受数量指标控制。

(二) 城市商业银行设立指标

城市商业银行成立年份数据主要通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提供的金融许可证数据、城市商业银行年报、网络信息等途径整理得到。为了确定各个城市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具体年份和月份,本文首先按照整理的185个^③城市商业银行名称与金融许可证数据提供的机构名称进行匹配。为了避免遗漏,本文根据城市商业银行所在省份或城市名称的前两个字与机构名称^④匹配,最终整理得到了169个城市从1995年到2016年的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信息,即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之一:本地城市商业银行业设立指标(*intra*),该变量在城市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当年及之后各年取“1”,否则取“0”。

为了得到各个城市设立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本文先从整理得到的各城市设立商业银行的完整信息中剔除设立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信息,再从剩余的数据中整理得到了294个城市从2006年至2016年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年份、月份信息,即本文的第二个主要解释变量: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指标(*inter*),该变量在城市出现其他城市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年份及之后各年取“1”,否则取“0”^⑤。

图2为1995—2011年设立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和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城市数量。虽然城市间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限制在2006年才放开,但是其扩张速度要远远快

^①1996年6月,在35个大中城市以外的满足特定条件的60个地级市开展组建工作;1997年12月,国务院批准在东莞等58个地级市继续开展城市商业银行的第三批组建工作。

^②这134家城市商业银行不包括已被兼并的城市商业银行。

^③由于存在城市商业银行兼并的问题,实际的城市商业银行数量并没有达到185家。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6年报》,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共有134家城市商业银行。

^④一般来讲,城市商业银行的名称都是与地级市的名称一致的,除了个别城市商业银行,如江苏长江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福建海峡银行、华融湘江银行、广东华兴银行等。

^⑤例如,1995年上海成立了上海银行,2007年宁波银行最早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对上海来说,关键解释变量1在1995年及之后年份取“1”,关键解释变量2在2007年及之后年份取“1”。

于城市设立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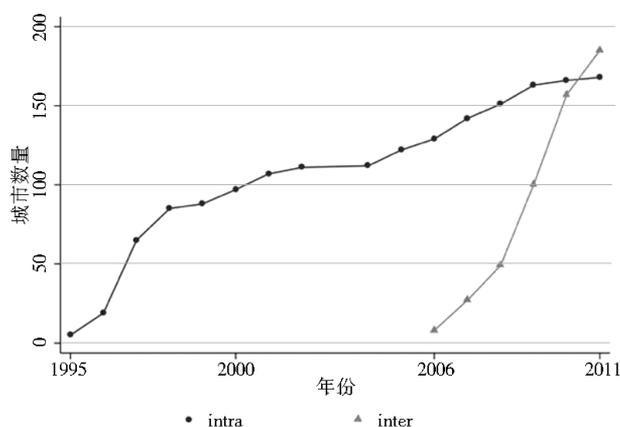


图2 历年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城市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银监会金融许可证数据。

上述两种类型的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来研究城市商业设立与企业出口的关系，为进一步考察两种类型的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提供了条件。本文实证研究数据到2008年，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郭峰等（2017）指出，2005年起，城市商业银行迎来兼并潮，尤其是2008年以后，共有32家城市商业银行实施兼并重组，远远多于2008年之前。城市商业银行的兼并重组使银行的金融资源不仅可以在当地流通，也可以转移到其他更有商业价值的地区，这会对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效应产生一定影响。第二，文章数据到2008年前避免了金融危机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

（三）城市数据

城市层面的经济指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实证部分涉及的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1）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定义为城市人均GDP的对数值；（2）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定义为城市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的对数值；（3）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包括城市人均铺路面积的对数值、人均出租车数目的对数值、人均公交车数目的对数值、人均邮局数的对数值；（4）城市中其他类型银行的发展情况，包括国有银行数量占比、外资银行数量占比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数量占比。

（四）企业数据

企业特征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参考聂辉华等（2012）^[24]和Brandt等（2012）^[25]的方法对数据库进行了处理。实证部分涉及的企业层面变量包括：（1）被解释变量（*export*）。一是企业出口选择，若企业出口额为正则取“1”，否则取“0”；二是企业出口额，定义为企业出口交货值的对数值。（2）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一是企业生产率，为以LP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二是企业规模，定义为企业雇佣人数的对数值；三是企业成立年限，定义为企业成立年限的对数值。

三、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一) 实证模型

由于各个城市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年份存在先后差异，与广泛使用的双重差分法不同，本文以城市商业银行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性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城市商业银行设立是否会影响企业出口。这种渐进性双重差分的方法也被很多学者用来研究不同领域的问题（Ferrara et al., 2012^[26]；Wang, 2013^[27]；郭峰等，2017）。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export_{ict} = \alpha + \beta CCB_entry_{ict} + \gamma X_{ict} + \varphi_i + \delta_t + \mu_c + \varepsilon_{ict} \quad (1)$$

其中， $export$ 为企业出口选择和出口额变量。 CCB_entry 为城市商业银行进入指标，包括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 $intra$ ）和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 $inter$ ）。如果某一个城市设立了城市商业银行，则在当年和之后的年份取“1”，否则取“0”。因此，这一指标同时体现了处理组与对照组、处理前与处理后的差异。 X_{ict} 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和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δ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φ_i 为企业固定效应，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但会影响企业出口的企业特征， μ_c 为城市固定效应， ε_{ict} 为误差项。所有回归的标准误均聚类到了企业层面。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表2为基准回归的结果^①。其中，表2第（1）至第（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出口选择，第（4）至第（6）列为企业出口值的对数值。

表2显示，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并未对企业出口产生正向影响，而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则有利于企业出口，提高企业的出口概率，增加企业的出口额。这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说1。

表2 城市商业银行进入与企业出口

变量	企业出口选择			企业出口额		
	(1)	(2)	(3)	(4)	(5)	(6)
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 (<i>intra</i>)	-0.010*** (0.0018)		-0.006*** (0.0018)	-0.122*** (0.0163)		-0.084*** (0.0164)
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 (<i>inter</i>)		0.023*** (0.0012)	0.022*** (0.0012)		0.226*** (0.0109)	0.220*** (0.011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979 545	1 979 545	1 979 545	1 979 545	1 979 545	1 979 545
R ²	0.011	0.011	0.011	0.023	0.023	0.024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并聚类到企业层面。*、**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本表省略了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的回归结果，以下各表同。

①限于篇幅，完整回归结果备索。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编辑部网站“刊文补充数据查阅”栏目查询、下载。

以上结果表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并没有真正起到“近水楼台”的作用，并不能促进企业出口。但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带来的“他山之石”效应使银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得到了改善，促进企业的出口。

(三) 机制分析

本部分考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影响企业出口的微观机制。

1. 企业类型

对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本文主要从不同类型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角度入手。表 3 为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与国有企业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对企业出口的回归结果，其中 *state* 为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从交互项的系数看，与异地城市商业银行不同，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主要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出口。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更能够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中获益。

表 3 城市商业银行进入与企业出口：企业类型

变量	企业出口选择		企业出口额	
	(1)	(2)	(3)	(4)
<i>intra</i>	-0.010*** (0.0018)		-0.132*** (0.0164)	
<i>inter</i>		0.023*** (0.0012)		0.239*** (0.0112)
<i>intra</i> × <i>state</i>	0.005*** (0.0010)		0.060*** (0.0089)	
<i>inter</i> × <i>state</i>		-0.005** (0.0021)		-0.075*** (0.018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979 545	1 979 545	1 979 545	1 979 545
R ²	0.011	0.011	0.023	0.024

由于缺乏企业层面的银行贷款数据，为了考察城市商业银行设立是否会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获取的银行贷款，本文参考郭峰等（2017），以企业是否有利息支出作为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代理变量。表 4 为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与企业类型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对企业是否获取银行贷款的回归结果。

从表 4 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并没有从整体上提高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概率，却显著增加了国有企业获取的银行贷款，这与表 3 的结论也是一致的。国有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增加无疑挤压了非国有企业所能获取的银行贷款。相比较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出口水平等相对较低。因此，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优化城市资本配置的作用，或改善“所有制歧视”，增加出口水平更高的非国有企业所能

获取的外部资金。这也解释了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并没有起到“近水楼台”作用的原因。

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不同,从表4第(2)列的回归结果看,异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显著提高了企业整体获取银行贷款的概率,而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由于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受地方政府的影响较小,对于外地城市商业银行来说,贷款给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国有企业显然是更优的。

表4 城市商业银行进入与企业银行贷款:企业类型

变量	(1)	(2)
<i>intra</i>	-0.041 *** (0.0025)	
<i>inter</i>		0.016 *** (0.0017)
<i>intra</i> × <i>state</i>	0.035 *** (0.0014)	
<i>inter</i> × <i>state</i>		0.061 *** (0.0029)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N	1 955 692	1 955 692
R ²	0.009	0.009

这一结果也表明,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本地城市商业银行依然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歧视”,而更愿意扶持当地的国有企业。但是,城市间设立分支机构限制的取消可以有效缓解“所有制歧视”对非国有企业带来的融资困难问题(Firth et al., 2009; 余子良等, 2016)。因此,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可以更好地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真正改善城市的资本配置效率。

2. 竞争效应

2006年起,城市商业银行被允许在异地(省内与跨省)设立分支机构,这也打破了当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垄断,城市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加剧。随着城市商业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也会更容易获取银行贷款。

为了考察异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是否会提高城市商业银行间的竞争,从而促进企业的出口,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与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的交互项,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的回归结果看,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与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与外地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确实存在竞争效应。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使城市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加剧,企业的出口增加。第

一，随着城市间设立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限制的取消，外来优质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加剧了城市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挤压了本地效率相对较低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改善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已有文献指出，不同类型银行间的竞争有利于强化市场在信贷配给中的作用（蔡竞等，2016）^[28]。相对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配置效率更高。随着外地城市商业银行数量的增加，城市商业银行间的竞争程度提高，银行业的信贷配置效率也因此得到改善，使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来进行出口活动。第二，外地优质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会对本地城市商业银行产生正向的外溢效应，从而增加企业的银行贷款，促进企业出口。随着外地优质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本地城市商业银行为了争取更多的贷款业务，也会提高其贷款效率。

表5 城市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效应

变量	企业出口选择	企业出口额
	(1)	(2)
<i>intra</i>	-0.006*** (0.0018)	-0.085*** (0.0164)
<i>inter</i>	0.017*** (0.0021)	0.117*** (0.0193)
<i>intra</i> × <i>inter</i>	0.007*** (0.0025)	0.128*** (0.0227)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N	1 979 545	1 979 545
R ²	0.011	0.024

3. 行业金融脆弱度

为了考察城市商业银行进入是否通过缓解企业所在行业的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生影响，参考已有关于信贷约束的文献（Kroszner et al., 2007^[29]；Manova et al., 2013^[30]），本文以行业金融脆弱度作为行业信贷需求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可以发现，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与外部融资依赖度交互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并没有缓解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的信贷需求，这也与前文的结果一致。另外，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与外部融资依赖度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有效缓解了对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的信贷需求，从而对这些行业中企业的出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中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的正效应是一致的。

表6 城市商业银行进入与企业出口：行业金融脆弱度

变量	企业出口选择		企业出口额	
	(1)	(2)	(3)	(4)
<i>intra</i>	-0.010*** (0.0018)		-0.121*** (0.0164)	
<i>intra</i> × (外部融资依赖度)	0.006 (0.0064)		0.030 (0.0599)	
<i>inter</i>		0.022*** (0.0012)		0.219*** (0.0110)
<i>inter</i> × (外部融资依赖度)		0.018*** (0.0040)		0.237*** (0.0362)
外部融资依赖度	-0.003 (0.0035)	-0.003 (0.0035)	-0.052 (0.0329)	-0.056* (0.03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979 545	1 979 545	1 979 545	1 979 545
R ²	0.011	0.011	0.023	0.024

四、稳健性检验

(一) 双重差分识别假设检验

虽然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随机的，但是 DID 的关键假定是在控制了企业和城市特征后，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与已经存在的企业出口的变化趋势是无关系的。因此这一部分主要检验了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是否满足 DID 的前提假定，为此本文分别采用了以下两种检验方法。

1. 平行趋势检验

由于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时间较晚，而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是从 1998 年到 2008 年，本文首先检验了在本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之前，早设立与晚设立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城市是否存在差异。如果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固定的，表示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中企业出口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满足平行性。

参考郭峰等（2017）的研究，本文将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分为三个阶段：2000 年之前、2001—2004 年和 2005—2008 年，并将前一阶段成立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城市视为处理组，后一阶段成立的城市视为控制组。具体的，本文比较了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设立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城市与其他城市在 1998—2000 年企业出口额的差异，以及至第三阶段设立了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城市和从未设立过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城市在 2001—2004 年企业出口额的差异。图 3 为按照以上方法得到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在各个年份企业出口额的对数值。从图 3 可以发现，虽然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的企业出口额在本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之前存在差异，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视为是固定的，即发展趋势一致。因此，可以认为晚成立本地城市

商业银行的城市是早成立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合适的对照组，也支持了双重差分的平行性假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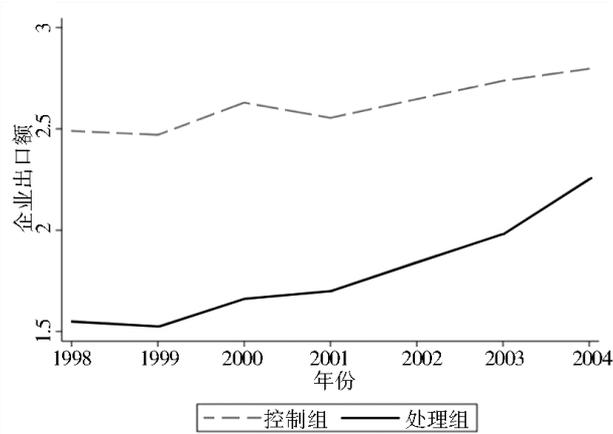


图3 平行趋势检验

其次，本文考察了企业出口的上升趋势是否在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之前就已出现。由于城市间设立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限制的取消是2006年，因此对于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的检验只能从其设立的前10年到后2年，具体的回归等式如下：

$$\text{export}_{ict} = \alpha + \beta_{-10} \text{inter}_{-10} + \dots + \beta_0 \text{inter}_0 + \dots + \beta_{+2} \text{inter}_{+2} + \gamma X_{ict} + \varphi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ct} \quad (2)$$

其中， inter_0 在城市设立异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年份取“1”； inter_s 在城市设立异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前 s 年取“1”； inter_{+s} 在城市设立异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后 s 年取“1”。

从图4可以发现，企业出口上升的趋势在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的当年开始出现，且企业出口的大幅上升主要发生在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进入之后。因此，图4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实证策略的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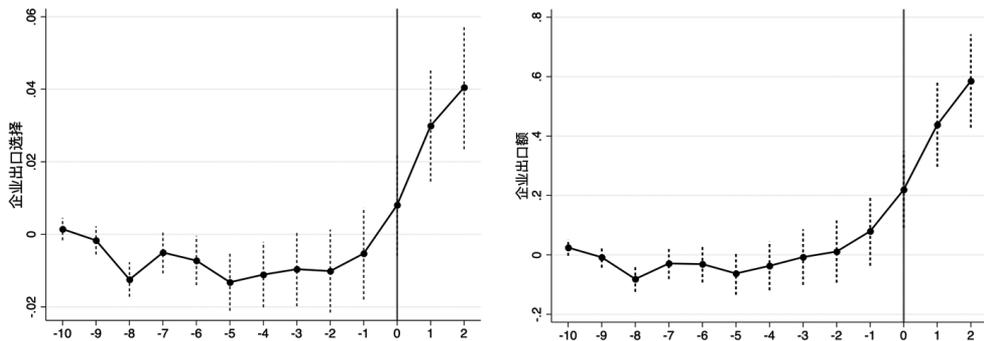


图4 异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前后企业的出口

注：图中的点为等式(2)的估计系数，虚线表示95置信区间。

2. 安慰剂检验

为了验证异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对企业出口的正向影响，本文实施了证伪检验。由于异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限制是从2006年开始取消的，因此本文从2006年到2016年中随机抽取异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年份，并确保这一年份与真实的年份不同，即构建一个“假的”异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年份。根据随机生成的“假的”进入年份，本文重新估计了基准回归模型，并进行了500次模拟。图5为模拟估计系数的累积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图5中虚线所表示的基准回归估计系数的垂线（企业出口选择取值为0.023，企业出口额取值为0.226）均位于模拟估计系数范围之外。因此，上述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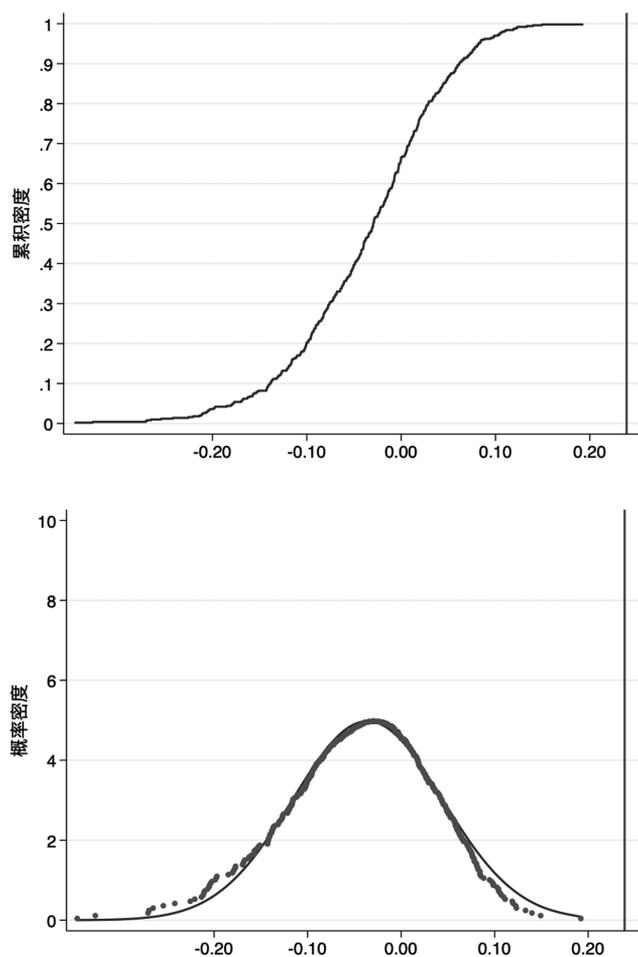


图5 安慰剂检验

(二) 其他稳健性检验

1. 城市商业银行设立指标

考虑到城市商业银行从筹建到开展存贷业务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文参考郭峰等

(2017), 利用城市商业银行的成立月份信息, 将月份为 1—5 月的定义为当年, 6—12 月定义为下一年。表 7 为根据重新定义的城市商业银行设立指标得到的结果。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变量 *intra2* 的系数仍显著为负, 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变量 *inter2* 的系数也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的结论是一致的。

2. 城市商业银行发展

不同地区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程度存在差异, 有可能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会设有更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基于此, 本文构建了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指标, 定义为本地(异地)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占城市总商业银行数的份额。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商业银行的渗透程度。此外, 城市商业银行数量的增加也意味着银行间竞争的加剧。

表 7 更换解释变量指标

变量	企业出口选择		企业出口额	
	(1)	(2)	(3)	(4)
<i>intra2</i>	-0.006*** (0.0017)		-0.091*** (0.0155)	
<i>inter2</i>		0.021*** (0.0012)		0.215*** (0.01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979 545	1 979 545	1 979 545	1 979 545
R ²	0.011	0.011	0.023	0.023

表 8 为城市商业银行发展对企业出口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并未促进企业出口, 而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对企业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与本文基准回归的结果也是一致的。

表 8 城市商业银行数量的份额与企业出口

变量	企业出口选择		企业出口额	
	(1)	(2)	(3)	(4)
本地城市商业银行数量的份额	-0.003** (0.0014)		-0.049*** (0.0128)	
外地城市商业银行数量的份额		0.005*** (0.0016)		0.059*** (0.015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888 044	1 888 044	1 888 044	1 888 044
R ²	0.011	0.011	0.024	0.024

同时,本地城市商业银行数量增加所体现的本地城市商业银行间竞争程度的提高并没有改善企业出口。因此,与机制分析部分关于两种不同类型城市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效应不同,本地城市商业银行数量的增加,或者说本地城市商业银行间竞争程度的提高,仍未能起到促进企业出口的作用。

3. 城市商业银行的兼并

从2005年至2008年,共有18家城市商业银行被兼并。例如,2005年合肥市商业银行、芜湖市商业银行、安庆市商业银行等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余7家城市信用社合并为徽商银行。

为了检验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效应是否会受到城市商业银行兼并重组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了城市商业银行进入变量与城市商业银行是否兼并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其中, *merger* 为城市商业银行兼并虚拟变量,在城市商业银行被兼并的年份及之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从交互项的回归结果看,城市商业银行的兼并对城市商业银行设立的效应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随着城市商业银行的兼并,一些效率较低的银行被效率更高的银行所兼并,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能力提高(郭峰等,2017),银行甄选高效率企业的能力因此得到改善,从而更有利于企业出口。

表9 城市商业银行的兼并

变量	企业出口选择		企业出口额	
	(1)	(2)	(3)	(4)
<i>intra</i> × <i>merger</i>	0.014 ** (0.0056)		0.213 *** (0.0534)	
<i>intra</i>	-0.008 *** (0.0018)		-0.106 *** (0.0170)	
<i>inter</i> × <i>merger</i>		0.010 *** (0.0017)		0.130 *** (0.0166)
<i>inter</i>		0.024 *** (0.0012)		0.241 *** (0.01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888 044	1 888 044	1 888 044	1 888 044
R ²	0.011	0.012	0.024	0.024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98—2008年金融许可证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本地和异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其对出口的影响,并分析了微观机制。研究发现,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并未促进企业出口。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不同,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则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这两种类型的城市商业银行间存在资本竞争效应,外地城市商业银行资本会挤出本地相对劣质的资本,从而使贷款资源分配

到更优质的企业，并对企业出口产生正向影响。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影响企业出口的微观机制在于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影响。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主要增加了国有企业获取的银行贷款，而外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进入则有效缩小了融资所有制差异，改善了城市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了企业整体的出口水平。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本文从企业出口视角，评估了我国银行业改革的经济绩效。相比于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设立限制的取消更能提高银行的信贷配置效率，优化企业的融资环境，尤其是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的企业。第二，从金融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更好起到“稳外贸”作用的角度来看，我国政府鼓励中小银行的跨区域发展，而非大银行的垄断的改革方向是符合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需要的。第三，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有限，因而银行体制改革的关键仍然在于推进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去行政化，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效率。

[参考文献]

- [1] 蔡卫星. 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J]. 金融研究, 2019, (4): 39-55.
- [2] 蔡卫星, 曾诚. 市场竞争、产权改革与商业银行贷款行为转变 [J]. 金融研究, 2012, (2): 73-87.
- [3] WANG C. Crony Banking and Local Growth in China [R]. BOFIT Discussion Papers, 2017.
- [4] 郭峰, 熊瑞祥. 地方金融机构与地区经济增长——来自城商行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J]. 经济学(季刊), 2017, (1): 221-246.
- [5] 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J]. 经济研究, 2004, (6): 33-40.
- [6] MIAN A. Foreign, Private Domestic, and Government Banks: New 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s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3, 27 (7): 1219-1410.
- [7] BECK T, LEVINE R. Industry Growth and Capital Allocation: Does Having a Market-or Bank-based System Matter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2, 64 (2): 147-180.
- [8] 钱先航, 曹廷求, 李维安. 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 [J]. 经济研究, 2011, (12): 72-85.
- [9] 蔡宏波, 宋研霏, 马红旗. 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与僵尸企业的形成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9): 80-98.
- [10] 何欢浪, 铁瑛, 刘启仁. 中国的银行管制放松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吗 [J]. 财经研究, 2019, (4): 83-95.
- [11] JAYARATNE J, STRAHAN P E. Entry Restrictions, Industry Evolution, and Dynamic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ommercial Banking [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8, 41 (1): 239-274.
- [12] RICE T, STRAHAN P E. Does Credit Competition Affect Small Firm Finance [J].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 (3): 861 - 889.
- [13] 铁瑛, 何欢浪. 金融开放、示范效应与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攀升——基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实证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0, (10): 160-174.
- [14] PONCET S, STEINGRESS W, VANDENBUSSCHE H.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 China: Firm-level Evidence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0, 21 (3): 411-422.
- [15] 聂辉华, 江艇, 张雨潇, 方明月. 我国僵尸企业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J]. 宏观经济管理, 2016, (9): 63-68.
- [16] BRANDT L, TOMBE T, ZHU X.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cross Time, Space and Sectors in China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13, 16 (1): 39-58.

- [17] BAI J, CARVALHO D, PHILLIPS G M. The Impact of Bank Credit on Labor Reallocation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8, 73 (6) .
- [18] FIRTH M, LIN C, LIU P, WONG S. Inside the Black Box: Bank Credit Allocation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9, 33 (6) : 1144-1155.
- [19] 余子良, 佟家栋. 所有制、出口行为与企业融资约束 [J]. *世界经济*, 2016, (3) : 26-48.
- [20] 吴延兵. 中国哪种所有制类型企业最具创新性 [J]. *世界经济*, 2012, 35 (6) : 3-25+28-29+26-27.
- [21] ZHANG J, WANG L, WANG 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2, 40 (3) : 393-412.
- [22] LEON F. Does Bank Competition Alleviate Credit Constrai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5, 57: 130-142.
- [23] 肖晶, 栗勤. 破除银行业垄断能够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吗 [J]. *南开经济研究*, 2016, (5) : 19-35.
- [24] 聂辉华, 江艇, 杨汝岱.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 [J]. *世界经济*, 2012, (5) : 142-158.
- [25] BRANDT L, BIESEBROECK J V,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 (2) : 339-351.
- [26] FERRARA E L, CHONG A, DURYEY S. 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2, 4 (4) : 1-31.
- [27] WANG J.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1: 133-147.
- [28] 蔡竞, 董艳.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J]. *金融研究*, 2016, (11) : 96-111.
- [29] KROSZNER R S, LAEVEN L, KLINGEBIEL D. Banking Crises,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4 (1) : 187-228.
- [30] MANOVA K. Credit Constraints,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3, 80 (2) : 711-744.

(责任编辑 刘建昌)

Inter-city Establishment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and Export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HE Huanlang ZHANG Tao WU Lanlan

Abstract: Based on financial license data, this paper took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city commercial banks (CCBs) and the cancellation of control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branches between cities as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and studied impacts of these two different establishments of CCBs on the export of Chinese firms and the micro-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cal establishment of CCBs has not promoted firm exports, but the inter-city establishment of CCBs increases the exports of firms. The local establishment of CCBs mainly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state-owned firms obtaining bank loans, while the inter-city establishment of CCBs alleviates the "ownership discrimination",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 and promotes firm exports. There is a capital competition effect between thes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CCBs.

Keywords: Local City Commercial Bank; Inter-city City Commercial Bank; State-owned Firms; Firm Export